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汉字 在日本的 文化意义研究

刘元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刘元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刘元满 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7

ISBN 7-301-06354-7

I. 汉… II. 刘… III. 日语-汉字-文化-研究 IV. 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5433 号

书 名: 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元满 著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354-7/G·088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8 印张 23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提 要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汉字文化研究的综述。汉字文化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学科，日本对汉字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作为背景知识，对日本的文字研究状况也做了一些相应介绍。

第二章主要就汉字进入日本的渠道以及“渡来人”对汉字的运用，利用考古研究成果及古文献资料，考察汉字因素在日本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章分析汉字在日本的变异融合过程。日本人在对汉字形、音、义进行多种变异、改造后，逐渐实现汉字本土化。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汉字意识也逐步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

第四章探讨汉字文化意义在上层社会和民间的不同表现特点。上层社会如皇权体系的天皇、年号的发展以及标准汉文的使用，普通社会则如人名、地名用字的变迁，“鬼”字的含义及用法，民众对某些字群的喜爱以及汉字带来的娱乐作用等方面，都反映出浓厚的日本的汉字文化特色。汉字文化在日本社会起着一种支柱性作用。

第五章论述中日汉字意义在近代的关联及影响，在文字改革方面也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为了给我国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阅读方面的便利，翻译整理了日本的部分文字资料，列为附表。

关键词：日本，汉字，汉字文化，意义

序

严绍澧

文化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以人类从石器工具时代进入金属工具时代作为标志，世界上出现了四大文明区域，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流域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各自独特的历史时期中，相继中断本身的发展而“变异”为另一种文明的形态。以黄河和长江为依托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出现进程的断裂，相反，这一文明超越了生成的本土，在亚洲东部地域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文明区域”。这一文明区域包括了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的东部。在这一广袤的地区中，尽管各民族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民族文化，都曾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自己内容的载体，作为记录自己语言的书面工具，从而，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历史久长而文明进程未曾断裂的“汉字文化圈”，组成世界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东亚文化史的研究，着重于在国别范围内阐述“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涉及东亚各民族文化的不关系的研究中，也主要是执著于诸如思想，哲学，文学，伦理，艺术等的“雅文化”层面。多少忽略了作为构成“东亚文明”的历史性载体的“汉字”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文化意义的思考、研究和相应的阐述。由于缺乏了对于“汉字文化”意义层面的把握，我们对于东亚

文明区的“文化内涵”的理解，有时候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偏颇，例如，有一部分学者把“东亚文明区”称之为“儒学文明区”，就是因为缺少了关于对“东亚文明区”内以“汉字”为各民族各国家文化基本连接键的知识，从而导致了“非事实性的描述”。

“汉字”的“文化学”研究的落伍，是由很多的原因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把“文字”列入“小学”的范畴，从而，即使学术界对于“汉字”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近代的观念和方法，但是其研究的范围，也主要还是更多地在“文字学”的范畴内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创导“汉字文化学”，开创了对“汉字文化”的研究^①。从而为进一步阐发“东亚文明区”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启示。

关于“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的研究，中日学者也曾零星涉及这一领域，但未见有系统的表述。北京大学刘元满博士以这一主题为中心，撰写成专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汉字文化学”领域中，以中国和日本的原典文献为基础，辅之以扎实的学术调查（此即现在文化学研究中所称的“文化田野作业”），精心思考，提升认识，从而事实有据地阐述了“汉字”东传日本列岛透入其本土文化的历史过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日本汉字”的文化学意义。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刘元满博士曾师从潘兆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攻读硕士学位。1996年到2001年又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课程，于2001年6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对于“汉语”和“汉字”具有浓厚的兴趣，常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在博士课程期间，她曾经在日本山梨女子短期大学从事教学两年，有机会就“日本汉字”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调查，对于

^① 参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等。

“汉字”东传日本并逐步地渗透入日本本土文化的历史图谱有了比较确切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她考察了“日本汉字”在日本文明的进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学”价值，从而构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作了再思考和再提升，现在贡献于读者的面前。

我作为刘元满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和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从她的思考和表述中获益良多，这倒不是客气的言辞。我虽然从事东亚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日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已近三十年了，但是，关于“汉字文化学”和“日本汉字文化学”的知识，却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本书以五章十五节三十余万字的宏大篇幅，追踪学术界先辈研究汉字文化的踪迹，阐述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历史过程，分析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交融”与“变异”，探讨“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并借鉴历史的经验，研讨了中日“汉字”在近代社会中的关联和影响。作者对于如此纷繁复杂又丰厚多彩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具有学术意义的梳理，对于多种原典材料，清理整合，排比清楚，层次分明，其论说叙述有致。从而，在“汉字文化学”领域中，中国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我在阅读本书时，觉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对于中国学者在理解上比较混乱的日本文化中“汉字”与“假名”的混用、以及“日制汉字”的形成与它的文化意义及其变迁等，都作了具有学术意义的阐述。本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汉字作为日本文化系统的重要支柱的价值和作用。过去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汉文学为中心的“文人文化”为对象加以展开论述的，而本书则着力于开发“日本汉字”在通俗文化以及皇权文化中的意义。这些领域的研究，常常为一般人所忽视，其实，正是在这些领域中，蕴藏着汉字文化的丰厚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我们认识“日本汉字”的文化意义打开了一个有趣味的新天地。我还要特别提出来的，关于

中日汉字文化在近代的关联和影响，这是一个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的领域，作者对此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考证了许多实地的材料，并且在日本与相关的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书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其作用将是积极的。

本书是作者数年来的心血之作。尽管关于“日本汉字”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还可以作更多层面的分析和阐述，但是，本书所展现的基本的学术路数，体现的原典实证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文献和文物资料的把握，对于学术史的追踪，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学术观念的构建和提升，使本书不作空口白话之说，从而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结论，分析得当，令人信服。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能够从本书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并且还可以修正以前从各种断章取义的论说中造成的知识偏见和学术偏见，形成关于东亚文明史的更接近于事实的理解。

严绍璗，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学术委员

北京大学教育部“东方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东洋研究委员会(CEAS)主席

目 录

序	严绍盪
导言	1
第一章 中日两国汉字文化研究综述	7
第一节 汉字文化学的建立	7
1 汉字文化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7
2 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语言文化学的关系	10
3 汉字文化的界定范围	13
第二节 汉字文化在日本各时期的发展状况	14
1 以词汇为中心	15
2 以汉字研究为中心	19
3 其他与文化相关的研究	23
第三节 日本汉字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	25
1 汉字与文化关系的早期研究	25
2 汉字文化研究的现状	27
第二章 汉字文化东渐的过程	29
第一节 日本史前的汉字文化因素	29
1 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状况	29
2 关于“神代文字”	34
3 中国汉字文化因素的传入	39
第二节 汉字东传的渠道	43
1 大陆、朝鲜半岛的移民前往日本岛	43
2 汉字文化发展过程中渡来人的作用	46
3 汉籍的传入	49
第三节 日本汉字文化的蕴藉过程	53

1 汉字记录的实践	53
2 汉字文化的展开	67
3 汉字文化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以日本国名为例	70
第三章 汉字融入日本文化的变异方式	75
第一节 日本文字体系的确立	75
1 对汉字的音、义进行整合	75
2 片假名进入文字系统	82
3 平假名的产生	86
4 日本文字体系的成熟——汉字假名混用	92
第二节 日制汉字的汉字文化特点	96
1 国字——补足汉字的手段	96
2 日制汉字中的文化意义	101
3 日制汉字的变迁	104
第三节 汉字意义的变异	107
1 汉字的“误读”	107
2 赋予词语新义	109
第四章 汉字文化——日本文化系统的重要支柱	113
第一节 皇权体系中的汉字文化意义	113
1 “天皇”之称体现出的汉字文化特色	113
2 天皇名字体现出的汉字文化特色	119
3 日本年号的汉字文化特色	123
第二节 姓名和地名中的汉字文化意义	130
1 普通人名用字变迁	130
2 女子名的特殊性	136
3 从地名看汉字意识的变化	137
第三节 汉字文化与日本普通社会的关系	143
1 “鬼”的实质	143
2 好恶情感在汉字文化中的折射	146
3 汉字与文学的关系	152

4 正统汉文形式的权威性	154
第五章 中日汉字文化意义在近代的关联及影响	157
第一节 汉字文化在近代的发展与变化	157
1 中日之间重要的沟通手段	157
2 近代以来日本汉字使用状况	160
3 汉字文化走向共同研究	163
第二节 近代日本词汇标记的变化	165
1 近代词汇的产生及特点	165
2 近现代日本的新词标记特点	170
3 日语中的外来词语	173
第三节 中日现代文字生活的影响与交流	177
1 日本几种文字改革的主张	178
2 美国在日本文字改革方面所实施的政策	180
3 日本对中国汉字改革的影响	183
4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日本文字的关注状况	186
附录	191
1 日本文化史时代区分	191
2 日语国字一览	192
3 日本天皇年表	200
4 日本的年号	204
5 常用汉字表及人名用汉字别表	208
6 中日汉字活动关联年表	213
7 主要万叶假名一览表	221
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	225
索引	231
后记	241

导 言

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汉字是中国的自源文字，在夏商时代就已经成熟，连绵数千年，不仅成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汉字产生更早的古埃及文、美索不达米亚文等文字，随着该地域文明的衰退而消失，或被其他文字所替代，而汉字直至现在仍然保持着自有体系，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不同的文化传统，创造不同的文字形式。汉文化向周边传播的同时，也促成了汉字向周边地区的传播。汉字曾经是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惟一文字，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汉字圈。尽管意识形态不同、经济水平发展相异，各国之间却依靠汉字这一共通文字而得到很大程度的沟通。

汉字一方面记录了汉文化，既可传之于异地，又可留之于后人，出色地发挥了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汉字圈的消长过程中，语言种类本身固然是汉字产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国家的文字政策、民族的文字意识也都会影响到汉字的发展，因而汉字具有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的特点。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这一特点使得汉字也是一字一音。由于汉字初始时期主要是象形造字，使它可以不直接与语音联系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汉字的形、义固定下来以后，理论上说可以用多种音去读它而不影响形、义。

物质文化是很容易流传到其他区域被人们接受的，作为记录语言工具的汉字也有这一特点。未自创文字的民族，一般都借用已有的文字。古代中国文化辐射到周边国家，汉字借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而被人接触认识，进而被学习并掌握，异民族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汉字，汉字成为汉字圈的共同财富，在土地广袤、民族众多的各地区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因而汉字长时期以来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

文字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其次，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至文明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把它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正如中国其他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在流入异域过程中都要发生“不正确的理解”——变异一样，他源文字的汉字也必须经过变异，即经过吸收、消化、再创造之后才能融入本土文化。汉字圈中成员虽都以汉字为文字(或主要文字)，但在共同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不同性质的内容。

文字的分布区域，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伸缩。时代流转千数百年，越南、朝鲜已退出了汉字家族，韩国的教育用字也不足千。现在语言性质不同而采用汉字的国家严格说来只有两个，即中国和日本。汉字是中国的惟一法定文字，而日语文字系统是汉字和假名的混合型。由于两国对汉字的处理方式不同，汉字在两国的文化表现也就各有特色。

产生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汉字，逐渐成为记录日本语言的工具，并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国语言系属不同，文化本质也不相同，汉字在进入日本过程中必定会受到排异。为使汉字成为一种记录日语的便利工具，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如日语文章就从完全使用汉字过渡为汉字假名混用的书写方式。如果只是全盘照搬，不经改造，汉字就永远只能是外文，不会成功记录日语，更不会融入日本文化，并成为其中一个极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共有汉字这一特点，使中日文化交流显现出相当的独特性。汉字对中日两国在艺术、民俗、思想、宗教、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影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汉字在日本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如日本国字的逆传、新词汇对汉语的补充。过去我们只注意到汉字作为语言工具层面的特点，而较少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中日汉字关系源远流长，很多现象仅靠研究汉字本身是无法解释的。中日交流随时代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曲线，汉字——特别是以汉字表现的词汇也会相应地有所反映。中日汉字关系研究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汉字，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的文字，它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概念，如同“汉籍”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也不等同于中国书籍一样。其他国家的汉字与中国汉字有亲缘关系，但不是中国汉字的附庸。过去我国在与汉字相关的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本土，认为异域使用的汉字不过是汉字的“遗泽”而已，视野还不够开阔，态度也有欠公允。与此相仿，在日本也有一些国粹主义者，挖空心思要为现存所有文化现象寻找本民族根据，在思想观念上以文化输入国为耻，对外来的文化持排斥态度，因而一度出现“神代文字”的神话。日本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从欧美国家得到了极大恩惠，新的治国策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东方不可小视的国家。由于这种成功是在否定传统、学习西方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取得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倾向也表现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认为汉字阻碍了教育发展。同时由于接触了西方文字，人们有了比较的意识，因此也对一直承担着记录日语任务的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究竟是否最适合记录日语？汉字的繁难是否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脚步？日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更有效率？日本的文字改革是从1866年（庆应二年）前岛密提出的废除汉字的建议开始的，从此对汉字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主观态度的原因，还是客观研究的需要，日本开始积极研究改进汉字的方法。有人埋头创制新文字，甚至有人提出极端的主张，认为仅仅改变日本文字系统还不够，应该从根本上改换日本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意识深处是将汉字与社会兴衰联系起来的。

志贺直哉1946年在杂志《改造》4月号发表《国语问题》：“我们从小就受教育而习惯了如今的国语，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认为再没有比日语更不完善、更不方便的言语了。它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因此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就绝没有希望成为真正文化大国。”他在自身近40年的文笔生活中痛感日语的“不便”，并对社会上流行的几种观点进行比较和评价，认为假名也好，罗马字也好，虽然苦心奋斗数年但都没有成功，特别是罗马字，诸多人士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却未能普及，其中必定存在致命的缺陷。他谈到

60年前森有礼^①曾提出把英语作为国语，如果真正实行，那么日本一定已得到无限的好处。他还认为与其改造日本語，不如干脆使用世界上最好的、最美的语言作为国语，而法语就最适合这个条件。这样他就不仅仅是对记录日本語的文字系统不满，而且更进一步把问题归结到日本語本身来了。他的这篇文章也完全按照他的原稿样式编排，全部都是旧假名用法以及旧汉字标记，以表示其蔑视战后日本的国语政策。^②

由于日本史前没有系统文字，汉字是当时所接触到的惟一的成熟文字，所以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汉字就是文字。但是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对世界的了解不再局限在狭小范围内，尤其是目睹中国政治的没落、文化的衰退，不少志士认识到因循守旧的严重后果，而带给西方近代化生活的工业文明使人们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而全面向西方学习，一下子涌现出大量的新事物、科技术语，汉字在记录新词语方面表现出不足。西方国家已经享受到机械活字的便利，而中国、日本还在进行着传统的低效率的雕版印刷；西方国家已经发明了适应于表音文字的打字机，而汉字离打字机时代还相当遥远。这一切都使得激进派对汉字产生抱怨情绪，直至提出把它打倒，而由其他文字代替的主张。

明治维新以来，政府致力于国民的教育普及，制定的方针政策基本是向西洋一边倒。最初废除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主张是占上风的。但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战后，日本的汉字改革并不如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它大概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假名文字论——罗马字论——限制汉字论，其间还有其他的主张。

汉字是中国的惟一文字，而日语文字是汉字和假名的混合型。汉字假道朝鲜半岛传入日本，逐渐融入到日本文化中。尽管日本后来发展了假名，出现了完整的表音系统，汉字地位不像中国那么绝对，但字音、字训、振假名、送假名、表记法等表音问题比中国更

① 森有礼，1847～1889年，曾留学英国，毕业后赴美，1868年在明治政府中任职，曾认为用英语替代日本語比较好。1885年任文部大臣，1889年被国粹分子刺杀。

② 佐藤喜代治主编《汉字讲座 11 汉字与国语问题》，明治书院，1988年6月，第305页。

复杂，因而汉字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出于对学习者的考虑，加上日语有假名的优势，“限制汉字”成为战后立足于现实的文字政策，汉字的数量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46年制订的《当用汉字表》有1850字，1981年修订为《常用汉字表》，有1945字，人名用字为166字，而JIS(日本工业规格用字)则有7000余字。

以词汇方面为例，虽然代表新文化的欧美外来词数量猛增，但代表传统的、深层的、精神层面的汉语词汇(包括固有词汇)依然为主干。如《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①的“人物关系名数”中都是日本历史上政治、军事、宗教、文学等人物，诸如“三大人”、“十二神将”等概称下均有详细人名。除“五人女”一条的女子人名含有个别假名外，其余所有条目都是汉字，包括佛教人物，如宫毗罗、波夷罗等译名。皇名用字一定用汉字，年号名称也必有汉籍出典，这说明汉字文化已经沉积下来，在日本人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大众意识中，汉字是日本文字的一部分，与现代生活关系密切，广泛用于各个生活层面，汉字的文化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分展现出来。

从中日两国对汉字的研究状况来说，也都呈现着各自的特色。

一种文化现象究竟在什么时候被借入，我们往往很难精确到具体年代，只能推断出一个大致时间。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没，汉字研究每一次的重大进展几乎总是继踵考古学取得新成果。关于汉字起源的研究，一直受着实物的制约。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实体，都保留在不易腐烂、能够长久留存的器物之上。从陶器开始到甲骨，继而金石、竹简(木简)，直到后来的纸张，汉字的书写材料在不断进步。而汉字的形体也不断地在调整、变化，出现了甲骨文、籀文、篆文、隶书、楷书、行书等。总的趋势是变得易写、易认。有了大量的文字材料以后，对汉字的研究才能有更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是汉字的故乡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汉字不是日语的自源文字，日本接受汉字时已经到公元四五世纪，这就决定了关于汉字的字源研究及音韵学研究只能依据中国古代文化。这种研究与日本古代文化是隔了一层的。在日本，研

① 《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教育社，1988年12月。

研究汉字最初是汉学家的事。一般来说，汉学家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汉字的字源(包括字形研究)；2. 音韵学；3. 说文学、甲骨学；4. 金石文；5. 书法；6. 万叶假名；7. 国字；8. 日语中的汉语词汇；9. 汉字在日本的发生、发展；10. 汉字与日本历史、文化、生活的关系等等。

如果说前四项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是重合的，可以资源共享，第五项则有交叉，而后几项的研究就需要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进行，这也是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独特表现之处。这些部分不独有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对中国的汉字文化研究也极有参考价值。我们需要了解汉字融入日本文化的轨迹，也需要了解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和日本有着怎样的不同。我们不能宥于“汉字是中国的”的狭窄视野，不能被所谓的民族感情所左右，必须将汉字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对象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

汉字在日本的发展既是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适应过程，又是一个作为文化因素的积累过程。汉字进入日本以后逐渐与日语结合，成为有效记录日本语言的工具；日本人的汉字意识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由上层社会逐渐浸染到民间，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文字观；汉字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汉字的影响作用也不可能低估。

他国使用的汉字不是中国文字的附庸。汉字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中国的汉字文化只是汉字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子系统。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有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发展轨迹。本书不是立足于本国文化的以史证字或以字证史的“汉字文化”研究，也不是基于文字资料的文字史研究及探讨文字规律的汉字学研究，但是要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这些学科成熟、丰富的研究成果，才使本书对“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得以展开。本书试图以多元文化观念研究汉字在日本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汉字与日本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关系，从而勾勒出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的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的汉字文化的特点。